

近年贵州高原新石器至商周时期文化遗存的发现与分区

吴小华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要: 贵州旧石器时代遗存分布较多,也是贵州考古工作的重点,新石器至商周时代的遗存之前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工作也较薄弱。近年来,主要是为了配合基本建设,开展了大量田野工作,发现了大量新石器至商周时代的文化遗存,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初步整理和分析,本文拟就对贵州高原新石器至商周时代的文化遗存做一初步的分区。初步将其分为五个大的文化区,但受限于材料的积累,分区工作还显得相当粗略,文化序列的建立更是难能企及。

关键词: 贵州; 新石器; 商周; 发现; 分区

中图分类号: K8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62(2011)01-0043-07

贵州是一个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发育良好的地区,山脉起伏,江河交错,长时间河流的切割与侵蚀形成了大量溶洞,为早期人类的生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天然住所。因此,贵州旧石器时代洞穴文化遗存十分丰富,且遗存的堆积和保存状况都较为良好。现已发现或已发掘的比较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如黔西观音洞^[1]、盘县大洞^[2]、普定穿洞^[3]、以及安龙观音洞、桐梓马鞍山、水城硝灰洞、兴义猫猫洞等,这些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无论是在西南地区仍至全国,在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在这些发现或已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绝大部分为洞穴遗存。相反,以前贵州新石器至商周时期文化遗存发现的却并不多。为此,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部分学者认为,像贵州这样的山区环境,洞穴随处可见,且大多环境良好,即便是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也无需到洞穴外面居住,天然的洞穴足以为这一时期的人类提供一个独具优势的居住环境;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贵州大部分自然环境比较恶劣,不适合发展农业生产,当人类从旧石器时代的攫取性经济向新石器时代的生产性经济形态转变时,环境的限

制自然使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早期人类因受到来自自然环境的极大压力而转向其它地区;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旧石器时代在贵州延续的时间较长,新石器时代文化在贵州还没有完全发展成气候就进入了铜器甚至是铁器时代,自然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分布有限。

近年来,随着大量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贵州考古工作者就这一课题做了不少工作,在贵州境内新发现了大量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如洪渡中锥堡史前至汉代遗址、沿河小河口新石器遗址、洪渡遗址、黑獭新石器至汉代遗址群(包括大河嘴遗址、李家坪遗址、木甲岭遗址、神坝渡遗址、黑獭堡遗址)、沙沱新石器时代遗址、月山背新石器时代遗址、坡脚新石器时代遗址、仙人洞新石器时代遗址、元卡地遗址、坎若遗址、烂草坪新石器时代遗址、江口新石器时代遗址、江明新石器时代遗址、天生桥新石器时代遗址、孔明坟新石器时代遗址群、沙坝遗址、拉它遗址、羊里新石器时代遗址、溪口遗址、潘寨遗址、洒亭遗址、六枝老坡底新石器时代遗址群、中水鸡公山遗址群以及金阳史前遗址群和开阳县哨上打儿窝史前遗址、金华肖家洞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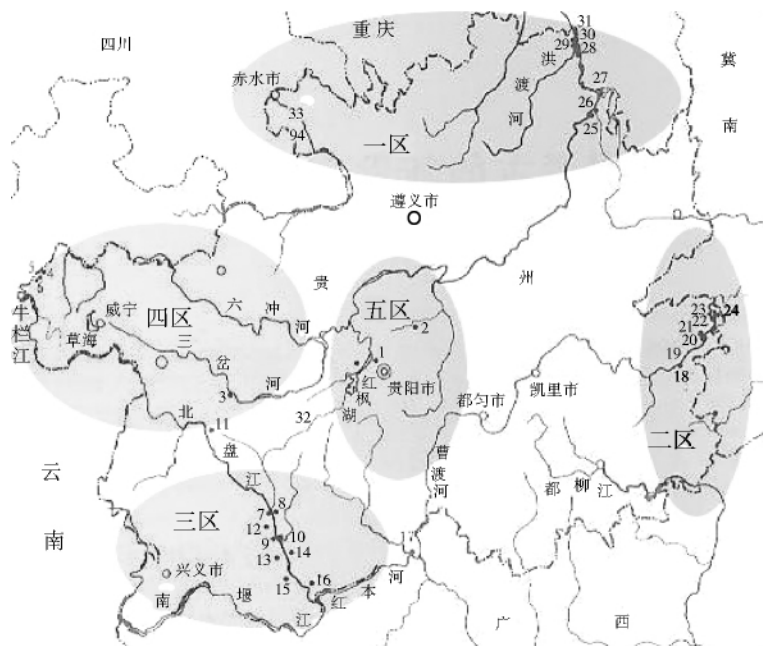
址、习水官仓坝遗址、习水黄金湾遗址、以及早年发现的毕节青场遗址、平坝飞虎山遗址等。这些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的发现，一方面初步建立起贵州局部地区史前至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另一方面无疑为我们重新认识贵州高原上的新石器至商周时期文化的区域性特点奠定了基础。

从目前所发现的考古材料来看，笔者试图将贵州高原上的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分为五个大的区域：

—

即以乌江、赤水河为传播枢纽的黔东北“巴蜀文化区”（指与传统的巴蜀地区的史前文化一致）。代表遗址有洪渡中锥堡史前至汉代遗址^[4]、黑獭新石器至汉代遗址群、沙沱新石器时代遗址^[5]等。从出土的遗物来看，这一地区的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与峡江地区的同一时期的文化遗存有着较大的共性。早期陶片主要以夹砂褐陶、红陶和夹砂黑陶为主，纹饰有绳纹、交错绳纹、方格纹等；稍晚的则有夹砂灰陶、褐陶、泥质灰陶以及泥质黑皮陶等；在纹饰方面，夹砂陶以绳纹为主，泥质陶绝大部分为素面，少部分饰有弦纹和戳印纹，以及少量的圆圈纹和乳钉纹等。器形有罐、釜、三足器、尖底盏、高柄豆、尖底杯、船形杯、陶网坠等。类似的遗址在乌江沿岸重庆辖区内的清源、万木都有分布，出土的遗物与上述遗址基本一样。

2006至2007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相继在沿河县境内的乌江沿岸的一、二级台地上发掘了洪渡中锥堡、黑獭大河嘴、李家坝、神坝渡等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遗址7处，发掘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在这7处遗址中，均有新石器至商周时代的文化堆积层。但总的来看，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层堆积较薄，出土的遗物主要是陶器和石器。陶器均为夹砂粗陶，陶器的火候较低，许多



图一 贵州近年发现新石器至商周时期遗址分区示意图

一区：黔东北巴蜀文化区 二区：黔东高庙文化区 三区：黔南、黔西南百越文化区 四区：黔西、黔西北混合文化区 五区：高原腹部文化区。

1. 金阳史前遗址群 2. 开阳打儿窝史前遗址 3. 老坡底新石器遗址群 4. 中水遗址群 5. 红营盘墓地 6. 银子坛墓地 7. 小河口史前至汉代遗址 8. 田脚脚遗址 9. 天生桥新石器至商周时期遗址 10. 孔明坟新石器时代遗址 11. 陋板龙商周汉代遗址 12. 坎田汉代遗址 13. 坡闷遗址 14. 拉它遗址 15. 元卡地遗址 16. 坎若遗址 17. 羊里遗址 18. 潘寨遗址 19. 茅坪遗址 20. 月山背遗址 21. 坡脚遗址 22. 仙人洞遗址 23. 烂草坪新石器遗址 24. 江口新石器遗址 25. 江明新石器遗址 26. 沙沱遗址 27. 黑獭大河嘴新石器至汉代遗址 28. 黑獭木甲岭新石器至汉代遗址 29. 黑獭神坝渡新石器至汉代遗址 30. 洪渡中锥堡新石器至汉代遗址 31. 洪渡遗址 32. 平坝飞虎山遗址 33. 习水官仓坝遗址 34. 习水黄金湾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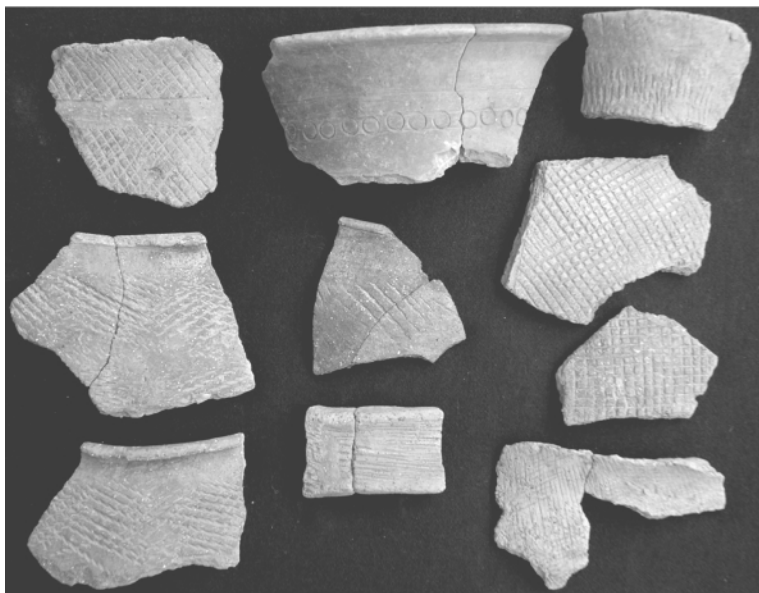
散成泥状无法提取。纹饰主要以绳纹和交错绳纹为主。器类可辨者有花边口沿罐、平底罐和钵等^[6]。石器多磨制石器，其料石多来自乌江两岸河漫滩上的鹅卵石。有大部分石料因长期受到江水的冲刷表面业已十分光滑平整，只需在刃部稍加磨砺即成器形便可使用。器形有斧、凿、镑、小石刀、网坠等，其中出土了大量小石刀。在上层堆积中，便出现了大量罐、釜、三足器、尖底盏、高柄豆、尖底杯、船形杯、陶网坠等商周时期的文化堆积，这一时期的文化堆积层也是这些遗址的主体堆积部分。在新石器时代的堆积层下面，未见有更早期的文化堆积层。从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些文化遗存均分布在乌江沿岸的一、二级台地上，在更高一级的台地上，基本没有类似的文化遗存的分布。

2009年,为配合贵州仁怀至赤水的高速公路建设,在习水县土城镇团结街道办事处发现了官仓坝遗址。该遗址位于赤水河西岸的一级台地上,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堆积厚度超过2.5米。调查时,在该遗址采集到的遗物有石器和陶片。其中陶片的火候较低,胎壁薄,多为灰褐、红褐夹砂陶;纹饰有交错刻划纹、交错细绳纹、压印纹,方格纹等;可辨器形有花边口沿罐、直口尖唇罐等。从采集到的这些出土遗物来看,其文化面貌与川东地区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另外,在土城镇黄金湾还发现一处商周至汉代时期的遗址,该遗址同样分布在赤水河东岸的一级台地上。调查时采集到的遗物主要有陶片,还有少量打制石器。陶片多为粗绳纹夹砂陶,火候较高,多灰褐与红褐色。另外还采集到陶网坠2件,以及部分水生和陆生动物骨骼遗存。这与在黔东其他地区出土的遗物较为一致。

总的看来,这一区域的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近则与重庆辖区内的清源遗址表现出极大的一致性。从地理单元来看,上述遗址本来同属于一个区域,都分布于乌江沿岸的一、二级台地上,只是近现代以来的行政区将其一分为二,以江为界,江北为重庆辖区,江南为贵州管辖范围。从更大的地理范围来看,这一地区的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十二桥文化,渝东地区的石地坝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共性。因此,从宏观的文化面貌考察,可将这一地区归属于“巴蜀文化区”这一大的概念内。当然,在小的范围内,还可能还有一些区域性的文化因素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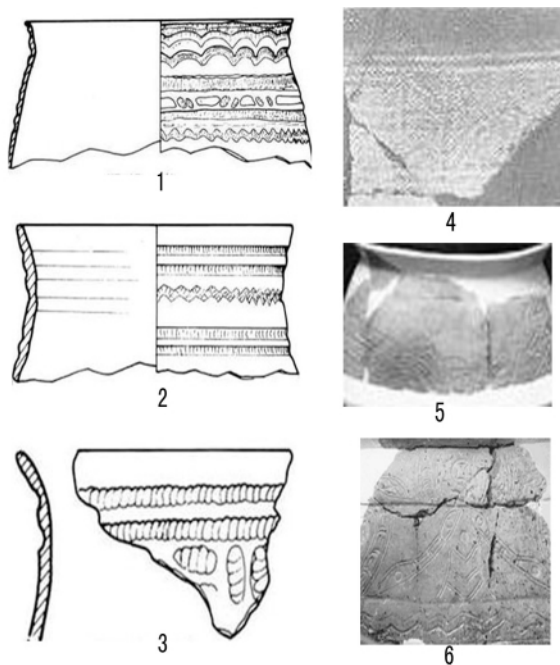
二

以清水江中下游为传播枢纽的黔东高庙文化区。代表遗址有月山背新石器时代遗址、坡脚新石器时代遗址、仙人洞新石器时代遗址、烂草坪新石器时代遗址、江口新石器时代遗址、江明新石器时代遗址等。2004年对天柱县境内的坡脚遗址进行了试掘,2009年至2010年8月,四川



图二 沿河县黑獭遗址群出土陶片

大学考古系、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先后对上述遗址群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从发掘出土的情况来看,这些遗址的下层都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层堆积,但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文化层堆积较薄,出土器物有陶器和石器,其中陶器出土量少,陶器的火候较低,陶片较为破碎,以夹砂陶为主,纹饰以绳纹、戳印纹为主,器形主要有



图三

1、2、3、4. 清水江坡脚遗址出土陶片
5、6. 湖南洪江高庙遗址出土陶片

钵、罐、釜等。但这些遗址出土的石制品都较为丰富,料石来源于青水江两岸的河漫滩,以打制石器为主,少数磨制石器,通体磨光的更少。器形多为刮削器,砍砸器次之,盘状器和尖状器也有少量出土。

其中在坡脚遗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堆积为该遗址的主体堆积。包含物多为石制品,少数为陶片,陶片少而碎,主要为夹砂陶,泥质陶极少。陶色有红、红褐、灰黑、褐、黄褐、灰褐、青灰、灰白、黄白等多种。器表多有纹饰,以绳纹最常见,其次为戳印小(长)方格纹,还有弦纹、划纹、兽面纹等,多见戳印的小方格纹组成条状纹和各种形制的图案。可辨器形有钵、罐、釜等。该遗址出土石器达 8100 多件,以打制石器为主,磨制石器较少,器形多为刮削器,砍砸器次之。在该遗址还出土了磨制的石钺和滑石壁,这在贵州尚属于首次发现。另外在学堂背遗址,也发掘出了大量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其出土的遗物与坡脚遗址基本一致,也是以打制石器为主,陶器较少^[7]。

从这一地区的所掌握的材料来看,目前在这一地区所发现的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也主要分布在清水江沿岸的一、二级台地上。从出土的遗物来看,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与湖南洪江高庙文化的中晚期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地理区域来看,也属于同一地理单元,应属于同一文化系统。

三

以红水河,南、北盘江为传播枢纽的黔南、黔西南百越文化区。代表遗址有天生桥新石器至商周时代遗址(2005 年试掘定名为木耳山遗址)^[8]、孔明坟新石器时代遗址、羊里新石器时代遗址、洒亭史前遗址等。从天生桥新石器至商周时代遗址、洒亭遗址以及羊里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土的遗物来看,陶片主要以夹砂褐陶为主,另有少量的夹砂黑陶和红陶,纹饰以绳纹为主,基本不见泥质陶;器形则以圆底器为多,有肩石器最为典型。这与广西马山县六卓岭、尚朗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极其类似,且带有强烈的东南沿海文化因素。

2005 年以来,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相继

在这一流域做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发掘的遗址主要有天生桥、孔明坟、沙坝、羊里等遗址。从发掘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这几处遗址均以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堆积为主体堆积。出土的遗存以遗物为主,遗迹主要有灰坑和墓葬,但遗迹数量极少。遗物主要以石器为主,陶器次之。石器多为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相对要少。料石均来自红水河、北盘江两岸的河漫滩。打制石器的器形以砍砸器为主,磨制石器的器形则以斧、锛、刀为主。同时还发现了一种通体磨制,两端带有一个乳突的板形器(器形名称未定),这种器形目前国内其他地区尚未见诸报道。

在孔明坟遗址,还发掘出了目前在贵州境内所见材料中最大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加工场,面积逾 700 平方米。该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共计 6 层,其中 4 至 6 层为该遗址的主体堆积,均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层。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的器物,又可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分为早、晚两期,其中,第 6 层为早期,4、5 层为晚期。在早期地层中,出土了大量的打制石器,从打制石器的加工工艺来看,锐棱砸击法是其剥片技术中的最为主要的方法,这一技术体系早在贵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兴义猫猫洞就业已出现。

另外,在天生桥,孔明坟以及上述两个遗址的附近,还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沙坝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双肩(部分为双重肩)石器,器形有斧、锛、大石铲、钺形石斧、凿、磨盘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双肩(或又重肩)石器。这类器形均以通体磨光居多,加工精细,数量也最多。

在出土的陶器方面,这一地区出土的基本上



图四 孔明坟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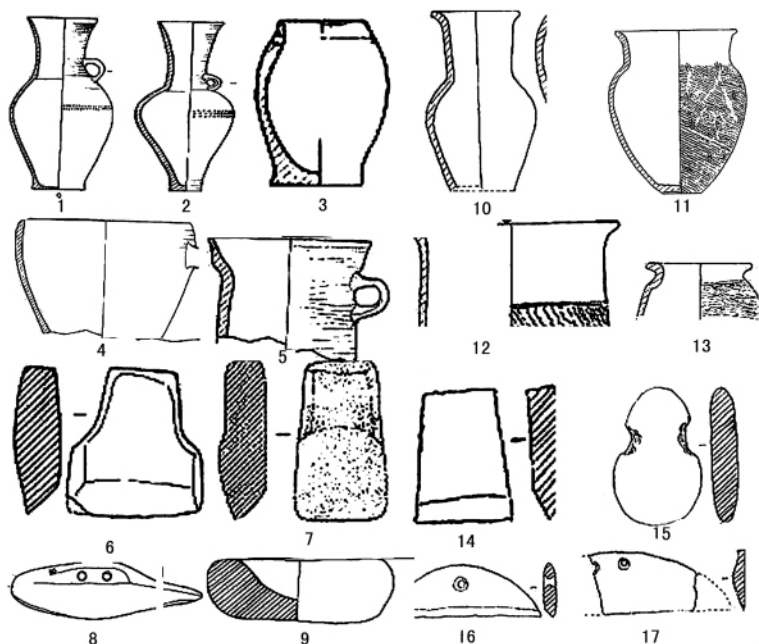
都是夹砂陶,火候较低。陶色以红褐、灰褐陶为主。纹饰主要以绳纹为主。在器形上则以圜底器居多,几乎不见平底、圈足等器形。

通过分析和对比,这一区域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与广西、岭南、以及东南沿海的同期文化面貌极其相似,应属于同一个大的文化系统。

四

以金沙江、横江、牛栏江、北盘江上游和三岔河为枢纽的黔西、黔西北混合型文化区。代表遗址有六枝老坡底新石器时代遗址群、中水鸡公山遗址群以及早年发现的毕节青场等。这一地区地处贵州西北部,与云南东部的昭通地区、四川西南部的凉山彝族地区毗邻。北面受到来自北方地区的文化因素传到四川盆地后再沿金沙

江继续向南扩张;西面受到来自西北地区的草原文化因素沿青藏高原东麓进入云南后则以昭通坝子为中心,以牛栏江为依托向东逐渐蔓延;南面则是受到来自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因素沿红水河、北盘江不断西进的侵扰;东面则是否受到贵州腹部地区的文化因素的影响现在还不清楚。由于受到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因素的影响,致使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表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即就是既不自成一体,又不能完全归属于其它地区的某一文化,含有多种文化因素是其中最为典型的特点。从鸡公山与六枝老坡底遗址群发掘所出土的遗物来看,在鸡公山遗址出土了少量带有西北地区氏羌文化因素、东南百越文化因素以及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因素的器物^[9]。而“鸡公山文化”^[10]的核心区域则显然是在云南昭通地区和中水盆地;六枝老坡底新石器时代遗址群出土的夹砂褐陶圜底器、夹砂陶片的陶质陶色与纹饰都与贞丰木耳山遗址试掘出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显然这与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因素具有一定的传承关系^[11];而早年毕节青场出土的有段石锛,与广西南宁地区出土的极为近似^[12]。根据已公布的考古材料,我国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西部和川西南地区,其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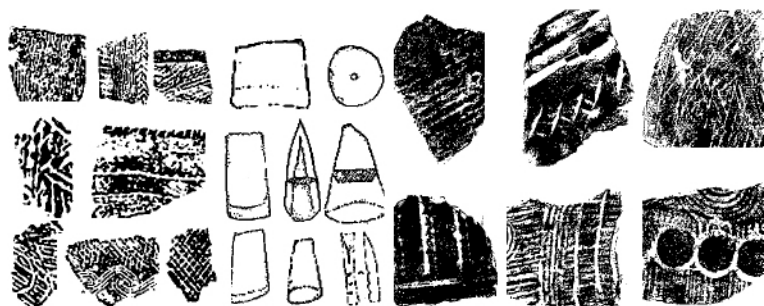


图五 鸡公山遗址与毕节青场遗址出土陶器、石器对比图

1、2、3、4、5. 鸡公山遗址出土陶器 6、7、8、9. 鸡公山遗址出土石器 10、11、12、13. 毕节青场遗址出土陶器 14、15、16、17. 毕节青场遗址出土石器

有一定的相似。云南江川头咀山、祥云清华洞、安宁王家滩、鲁甸马厂、晋宁石寨山、云县忙怀以及滇池周围、澜沧江中上游地区,都发现有段石锛、双肩石锛、双肩石斧为特征的新石器文化遗存。贵州西部地区的盘县等曾采集到磨制的双肩石斧,水城和威宁发现了少量的有段石锛。川西南的雅安江北岸的斗胆村和沙溪村亦发现过被称为“有柄的石锄”的双肩石器。有段石锛和双肩石斧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典型遗存,这些石器在云贵高原和川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普遍发现,反映我国西南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的联系^[13]。这一地区的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包含的文化因素较多,内涵更为复杂,因此笔者将其称为混合型文化区。

同时,这一地区还表现出一个特点。从文化的整体面貌和大的区域范围来看,受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是其共有特征,但各个小区域的地域性特征也表现得异常明显。以威宁中水鸡公山和毕节青场为例,虽然从地理单元上看,两地相距的距离并不是很远,地貌单元也极其相似,但在文化面貌上却又相差较大。似乎这一地区也同时呈现出一种“大杂居”、“小聚居”的势态。由于



平坝飞虎山出土陶片和石器

开阳打儿窝遗址出土陶片

图六 平坝飞虎山与开阳打儿窝遗址出土遗物对比^[8]

这一地区发掘的资料较少，近几年的工作也相对薄弱，更多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资料积累，目前得到的还只是一个较为宏观的印象。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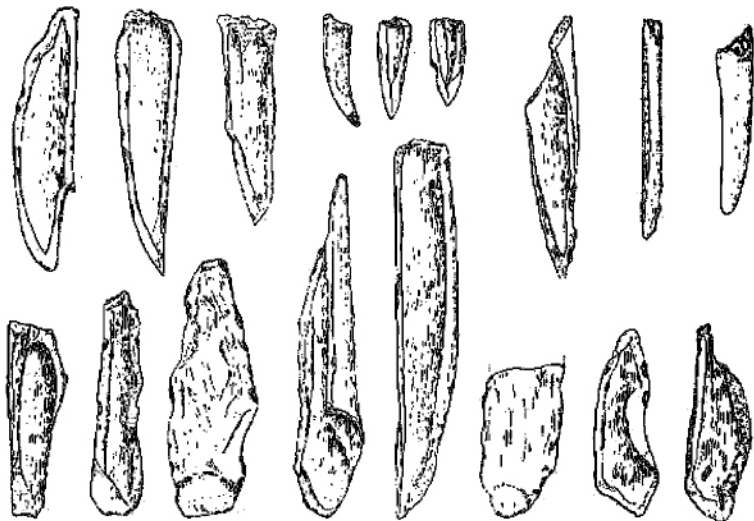
以贵阳市为中心的高原腹部文化区。代表遗址有金阳史前遗址群、平坝飞虎山、开阳县哨上打儿窝遗址和贵阳金华肖家洞史前遗址等。金阳史前遗址群是近年来发现的，基本上为洞穴或崖厦遗址，正式发掘的较少，但从调查时所采集到的陶片来看，几乎都是夹砂陶，少有泥质陶；色泽有红色、褐色、灰色、黑色等；大部分火候较高，陶片上的纹饰有绳纹、篮纹、戳印方格纹、锥刺纹、附加堆纹、划纹等^[14]；平坝飞虎山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掘，从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遗物来看，石器主要有锛、斧、纺轮、箭（矛）头、石球、磨石、玦、刮刀等，但无论其

形制、还是制作工艺都较为原始；骨（角）器多见的骨锥和骨铲，打制和磨制均有；遗址出土的陶片多为夹砂绳纹，此外还有方格纹、刻划纹、篦纹、锥刺纹、圆圈纹以及附加堆纹等，从器形上看，虽无完整器形，但多大翻口圆唇、小翻口圆唇或尖唇，敛口薄直唇、直口加厚直唇等，且多以手制为主，此外还第一次在云贵高原上发现了彩陶。报告指出这不仅与华南赣、粤、桂诸省的洞穴遗址完全不同^[15]，就连与贵州其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差异也很大。正如童恩正先生所述，在贵州腹地，平坝飞虎山洞

穴遗址显示了另外一种风格^[16]。2003年发掘的开阳哨上打儿窝史前遗址出土的陶片，多为夹砂褐陶，虽然与飞虎山一样陶片过于细碎无法辨认出器形，但从纹饰上看，打儿窝出土的陶片有方格纹、绳纹、戳刺纹、划纹和少量圆圈纹^[17]，这与飞虎山出土的陶片极其相似。同样，在开阳打儿窝遗址也有骨器出土。

2006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试掘了位于贵阳市北郊的金华镇肖家洞遗址。该遗址的主体堆积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试掘面积为2平方米，遗址地层堆积厚度达2.5米以上（未见底），出土器物主要有磨制骨（角）器、磨制石器、打制石器和陶片。其中磨制骨（角）器就有八十余件，器形主要有骨铲和骨锥；石器多为石片，磨制石器较少；陶片出土极少，仅有数片，且较为零碎无法辨别其器形，纹饰有绳纹、方格纹、戳印圆圈纹等，与平坝飞虎山、开阳打儿窝遗址出土的陶片极为类似。

从出土的陶片来看，这一地区最为典型的是带有方格纹、绳纹、划纹、圆圈纹和锥刺纹的夹砂陶片；石器则是以打制石器为主，磨制石器较少；相对来讲，骨（角）器出土较多，主要以骨锥和骨铲为主，这是与其他几个地区区别较大的地方。从自然、地理环境来看，这一区域与上述四个区域都不一样，一至四区都是以大江大河作



图七 平坝飞虎山出土的骨（角）器

为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与传播的枢纽, 遗存主要分布在大江大河沿岸的一、二级台地上。而以贵阳为中心的高原腹部文化区则是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 四周群山环绕, 遗存多分布于洞穴或是岩厦。这一区域没有大江大河与外界相通, 自然条件的限制使它很难与外界进行交往, 因此在这区域内的遗址(均指新石器至商周时期部分)中很难见到其它地区的文化因素也在情理之中。上述遗址的下层均压着有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这两者之间(新、旧石器时代文化)是否存在着有一定的渊源或传承关系虽然就目前的考古材料看还不能过早下此定论, 但这一地区独特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应该与当地的先民有关则是无疑的。当然是否能命名为一种文化或是一种文化类型目前还缺乏典型遗址和更多的发掘材料作支撑。但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与周边地区相比而言, 其独特性则是无容质疑的。

从近年来的发现与分区来看, 贵州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绝大部分都是分布在大江大河沿岸的一、二级台地上, 在上述的五个分区中, 除以贵阳为中心的高原腹部文化区外, 其余四个区域都是以大江大河作为文化发展、交流与传播的枢纽; 二是每个分区内文化遗存的地域化表现得比较明显, 在几个大区之间, 现在的考古材料还基本上看不出两个或多个文化区之间过渡带的存在, 这是否是因为自然环境的隔离造成贵州高原上的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分属于不同的小地理单元现在还不敢妄加断言, 但影响是无疑的。比如说乌蒙山脉以西的鸡公山文化与以东的毕节青场遗址, 虽然从地理位置上看比较接近, 但差异却是明显的; 三是缺乏自成一体的发展序列, 特别是在每个分区内各个文化的来龙去脉还很不清楚; 四是因为地理因素和自然环境的不同, 其经济形态也有较大的差异, 如在一至四区(特别是一至三区更为明显), 由于大部分遗址都分布在大江大河的沿岸台地上, 渔猎经济形式表现得特别明显, 最为直接的证据就是在这些遗址里都出土了大量的网坠。而在以贵阳为中心的腹部地区, 因为大部分遗址都属于洞穴或岩厦遗址, 像网坠这样能反映渔猎经济形态的遗物基本不见。但这些遗址却出土了较多的动物骨骼、砍砸器, 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这一地区的狩猎经济异常兴盛。在黔西北的混合文化区内, 似乎除了渔猎、狩猎经济兼而有之之外, 还有更为发达的农业经济形态。这一区域的河流较小, 森林覆盖率也较低, 又处于真正的云贵高原区, 海拔都在1500米左右, 显然渔猎和狩猎经济不可能太发达, 农业才是其经济之本。在威宁中水鸡公山等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稻谷遗存和农具便是例证。五是从这些遗址的堆积来看,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堆积普遍较薄, 出土遗物以石器为主, 陶器较少。进入商周时期后, 陶器出土增多, 石器加工更为细致, 但铜器出土极少。从总的文化面貌观察, 贵州高原这一时期的遗存相比于中原地区, 其文化面貌显得要单一得多。六是从各个区域遗址的堆积情况来看, 大部分新石器时代的堆积很薄, 有时甚至很难将其与商周时期的文化堆积区分开来, 而商周时期的堆积大都直接叠压其上且堆积要厚得多, 出土的遗物也是相对的要丰富得多。并且在新石器时代的堆积层中极少有发现如灰坑、房屋和墓葬等遗迹。种种迹象似乎表明, 在这一地区, 新石器时代延续的时间较为短暂, 当然是否如部分学者所说的有很大部分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直接过渡到了商周时期这一论断还不敢过早下结论。

此外, 近年来发现的这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基本上都是配合基本建设调查发现的, 在不久的将来, 这些文化遗存都将不复存在。一方面, 它为我们发掘这些遗存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但另一方面, 由于人力、物力及财力方面的种种原因, 我们也无法完全将这些历史文化遗存发掘出来, 这对我们今后长期的研究工作来说, 损失无疑是巨大的。所以, 在现阶段的抢救性发掘中, 我们必须尽可能完整的提取资料, 以便于今后的研究工作。

注释:

[1] 1964年,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贵州省博物馆联合调查发现, 并进行首次试掘, 《贵州省志·文物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3年, 贵阳。

[2] 1990年发现, 1992~2000年, 由六盘水文物管理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贵州师范大学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作了6次发掘, 《贵州省志·文物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3年, 贵阳。

[3] 1978年, 贵州省博物馆调查发现, 1979年进行试掘 《贵州省志·文物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3年, 贵阳。(下转第67页)

定需要懂绘画,就可以制作出规整的青铜器。时至今日还是相同道理,只要恪守规矩,不一定需要识谱,就可以演奏戏曲。商周青铜器纹饰中的主纹,类似今天戏曲中的唱腔,而雷纹,则就是唱腔之间的过门,是起填空作用的,是有章可循的,是要严格按规矩操作的。否则,就难以相互配合。不论制作青铜器,还是演奏戏曲,都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完成的。对一般人而言,发明创造是困难的,那只是极少数人的作为,相对发明创造而言,一般人的模仿能力极强,理解规矩是很快的。只要学会了某件事务,守规矩则多是潜意识的。本文只是用了古代青铜器的制作工艺与现代戏曲作了讨论,其实应该如司马迁所说“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所以笔者认为,规矩贯通着整个中国历史及各种生产与事务,还将会继续贯通未来。

注释:

[1] 何薇硕士学位论文《商前期青铜器的范铸工艺》,2006 年 6 月。

[2] 董亚巍《商晚期圆形鼎的范铸模拟实验研究》,《四川

文物》,2010 年 5 期。

[3] 陈有路硕士学位论文《商晚期椭圆形壶的模拟实验》2013 年 6 月。

[4] 董亚巍《西周早期圆形尊的范铸模拟实验研究》,《中原文物》2010 年 1 期。

[5] 余铃珠硕士学位论文《商晚期圆底簋及西周早期方座簋的范铸模拟实验》2009 年 6 月。

[6] 司马迁《史记·礼书第一》第 151 页,岳麓书社 1995 年 6 月第 10 次印刷。

[7] 张少昀硕士学位论文《西汉星云镜铸造工艺模拟实验》,2010 年 6 月。

[8] 山西省考古所《侯马陶范艺术》,普林斯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9] 此图摘自上海博物馆《炼形神冶莹质良工——上海博物馆馆藏铜镜精品》,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5 年 4 月。

[10] 南普恒等《湖北盘龙城出土部分商代青铜器的铸造地分析》,《文物》2008 年 8 期。

[11] 此图于 2009 年 12 月 10 日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12] 关于为什么制作双头雷纹的问题,以及雷纹的设计原则,将另文发表。

[13] 与 [11] 同。

[14] 此图于 2008 年 6 月 20 日摄于宝鸡青铜博物馆。

[15] 此图摘自《中国青铜器全集商 4》第 5 页,文物出版社 1998 年 9 月。

(上接第 49 页)

[4] 洪渡中锥堡史前至汉代遗址,2006 年 12 月发掘,简报待发。

[5] 沙沱新石器时代遗址,2005 年发掘,简报待发。

[6] 张合荣、吴小华、张兴龙、张改课.《贵州沿河抢救发掘新石器晚期至商周遗址群》,《中国文物报》2007 年 4 月/20 日/第 2002 版。

[7] 于孟洲、白彬.《贵州天柱史前遗址群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0 年 6 月/18 日/2004 版。

[8] 吴小华《2005 年度南方地区考古新发现·贵州省(五)贞丰县木耳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南方文物》,2006 年第 3 期。

[9] 张合荣、王林、罗二虎《贵州威宁县鸡公山遗址 2004 年发掘简报》,《考古》,2006 年第 8 期。

[10] 张合荣、王林、罗二虎《贵州威宁县鸡公山遗址 2004 年发掘简报》,《考古》,2006 年第 8 期。

[11] 王红光《贵州考古的新发现和新认识》,《考古》

2006 年第 8 期;张合荣《贵州六枝老坡底抢救发掘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群》,《中国文物报》,2005 年 10 月 5 日。

[12] 何凤桐《毕节青场新石器》,《贵州文物》1982 年第 1 期。

[13] 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 年,南京,第 287 页。

[14] 陈石《金阳史前文化探秘》,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年,贵阳。

[15] 李衍坦、万光云《飞虎山洞穴遗址的试掘与初步研究》,《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 年。原载《史前研究》1984 年 3 期。

[16] 童恩正《略论我国西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南方文明——童恩正学术文集》,重庆出版社,1998 年。

[17] 王红光《贵州考古的新发现和新认识》,《考古》2006 年第 8 期。

[18] 注:开阳打儿窝陶片拓片由王燕子提供。报告待发。